

# 于坚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四个关键词

刘书景<sup>1</sup> 冷南羲<sup>2</sup>

(1.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于坚的诗论是其日常生活诗学的基石。在其诗论中,抚摸、神性、柔软、后退这四个关键词值得注意。抚摸,定义了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为诗人大力创作日常生活诗歌扫除了心理障碍;神性,体现了诗人将日常生活升华的努力,以及对诗歌创作的虔诚;柔软,开启了对附着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权力的清理,为日常口语和经验常识进入诗歌提供合法性;后退,传达了诗人对日常生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紧张关系的密切关注。虽然这四个词并不能涵盖于坚诗论的丰富内涵,但清晰地展示了于坚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脉络。

**关键词:**于坚;日常生活诗学;抚摸;神性;柔软;后退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9)02-0051-08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19.02.008

于坚的诗论是解读其诗歌的密钥,他的诗论中  
 关及日常生活创作的诗学理念,是建构其日常生活  
 诗学大厦的基石。由于于坚始终站在日常生活的  
 现场来发声,其诗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难免有  
 重复、矛盾、混沌甚至偏见之处,因此,研究者不仅  
 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辨析,更要从整体上把握于坚  
 诗论的内在逻辑。笔者此文即从于坚的诗论中提  
 取出抚摸、神性、柔软、后退四个关键词,结合诗歌  
 文本,梳理其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脉络,从而加深  
 对于坚日常生活诗学的理解,把握其诗学背后的现  
 实关怀。

## 一、抚摸——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抚摸”字面义为用手来回触摸,既让人想到情  
 人间的亲昵,也让人想到母亲给孩子带来的温暖。  
 于坚最初用“抚摸”来形容人和神的和谐关系。吴  
 哥窟的神像“处于人伸手可触的位置”而被人们抚  
 摸得闪闪发亮,于坚从中看到了“人和神的关系是  
 亲切的,合欢的,是‘抚摸’”<sup>①</sup>,并将故宫、云冈石窟  
 与吴哥窟对比,指出故宫、云冈石窟因“高高在上,  
 威严冰冷”,拒绝了人们的抚摸,人们也不会对它们  
 产生敬畏<sup>②</sup>。抚摸是发自内心的亲近、尊重和敬畏,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刘书景(1987—),男,江西赣州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冷南羲(1993—),男,四川成都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于坚《棕皮手记·1992~1993》,《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②于坚说“中国的故宫不同,在这个没神的国家,王权就是神,神是形而上而又充满功利,世俗气味的。在故宫看不到任何具体的细节,只有一些‘高’‘圆’‘方’‘大’的东西令人双膝发软,心生恐惧,你意识不到建筑本身的魅力,而是敬畏于它的象征隐喻,经过一个又一个大殿,一层又一层阶梯,到皇帝宝座面前,所有个人话语早已臣服于权力话语,但人内心并不服气,他的潜在心态是‘总有一天’和‘与天斗其乐无穷’。所以权力话语一旦失势,人们就践踏它,调侃它,把它当作小丑。”参见于坚《棕皮手记·1992~1993》,《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另外,于坚在《参观故宫》这首诗中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于坚《参观故宫》,《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8-269页。

③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136页。

人们在“抚摸”神像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蕴藉,达到人与神的和谐。于坚用人与神的“抚摸”关系,来定义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的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sup>①</sup>“抚摸”日常生活,就意味着诗人不仅要正视眼前的日常生活,更要从心理上亲近、尊重、敬畏日常生活。

“抚摸”关系的提出,针对的是日常生活被忽视的现状,主要包括: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到朦胧诗崛起的这一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普遍忽视。二是以西方文化资源为写作资源的诗歌创作,于坚认为这些充斥着西方词汇的诗作只会让西方读者不以为然<sup>①</sup>。这些西方文化资源脱离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难免水土不服。这种分歧后来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三是沉溺于古典农耕庆典的诗人创作,例如于坚认为海子等的诗歌就是脱离了日常生活。简而言之,“抚摸”就是要扭转受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文化知识和浪漫的古典主义束缚而脱离日常生活的写作倾向,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抚摸”关系,跟传统文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历代文人都有浓厚的入世情结,当世道无常,或者仕途失意时,他们往往则选择出世,或归隐于日常生活,或寄情于山水。但这实际上是把玩日常生活的心态与旨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猛志固常在”,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sup>②</sup>历代的文人们将日常生活当作排遣失意的工具,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认同。

“抚摸”关系的提出,离不开诗人对日常生活本体价值的认识。在《何为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这篇散文中,于坚对日常生活的本体价值作了如下分析:首先,于坚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生最基本的生活”,“从这种生活开始,我们才有根基进行关于存在之意义的种种疑问和假设”,日常生活天然地存在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意义的起点,

元初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能被诗人们所忽视。第二,相对于时代的沧桑巨变,“日常生活是旧的”,日常生活有自身的自在节奏,不是日日新,具有保守性和惰性,其基本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其三,日常生活“不可能只服从于任何单向度的意义”,既然日常生活是意义的起点,是元初的存在,具有自身的节奏,那么,日常生活的意义就是多元的,而不能定于一尊,不能被单向度的意义所规训。<sup>③</sup>意识形态、技术权力都不能以单一的价值取向来规训日常生活的价值,“文革”期间将日常生活作为罪行的行为,当下现代化进程对日常生活的侵蚀,都是以一种单向度的意义来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训。因此,于坚认为前者是“文革”的巨大悲剧之一,并对后者保持警惕。认识到日常生活的本体价值,诗人才能真正从内心认可、亲近和呵护日常生活,这就为诗人打破思维的藩篱,大力创作日常生活诗歌,扫除了心理障碍。

“抚摸”日常生活,就是要抚摸当下的、此在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抚摸一个虚构的、彼岸的、未来的乌托邦。于坚的诗歌重在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诸如高原边地人民的劳作、大山子民向山外探索,“文革”动乱中小市民、工人、同事、亲人、城市边缘人的日常等。同时,于坚还将视角转向日常事物当中,如啤酒瓶盖、空啤酒瓶、油桶、灰鼠、黑马、蚂蚁、蝴蝶、棕榈、网球等,从日常之物中发现诗意。而日常事件如铺路、婚宴、游园、雨天来客、开会、看望病人、朋友聚会等,不管多么无聊琐碎,于坚都认真地呈现各种细节。于坚的诗歌始终扎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发声,随着时代的发展,于坚诗歌的关注点也有所变化。如果说,于坚早期的创作目的是将日常生活从被忽视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那么,于坚之后的创作则更加关注现代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阵痛,诸如环境污染、人的异化、日常生活空间的破坏等。于坚的日常生活诗歌,是“抚摸”日常生活的

<sup>①</sup>于坚说“这些诗人分行排列中,充满了玫瑰、大胡子铁匠、敲钟人、石榴树(因为埃里蒂斯疯狂过石榴树)、罗马的军队、希腊的石柱、十字架、城堡、女巫等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读了哑然失笑。”参见于坚《棕皮手记·1992~1993》,《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sup>②</sup>蔡翔就指出“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常常具有双重的能指功能,一方面,在其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严重对立的时候,退而成为某种诗意人生的象征;而另一方面,在个人入世之心正强,社会乌托邦高扬的时候,却又成为某种桎梏理想消磨壮志的象征,直接意指着庸俗化的现实人生状态,乃至于被批评被扬弃。”参见蔡翔《日常生活诗情的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sup>③</sup>于坚《何为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86-88页。

典范!

## 二、神性——诗人升华日常生活的雄心

将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定义为“抚摸”，为诗人创作日常生活诗歌扫清了心理障碍，改变了日常生活创作中的地位。但于坚并不满足，他还要构建日常生活的“神性”。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词“神性”来形容诗歌中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突兀。林语堂先生就指出“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种灵感与活跃的情愫”。<sup>①</sup>于坚自己也说“诗是宗教。”<sup>②</sup>既然诗歌在国人心中具有宗教一般的神圣地位，那么，写入诗歌的日常生活，不也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吗？于坚建构日常生活的“神性”的逻辑出发点正在于此。

“神性”，就是升华<sup>③</sup>抑或艺术化，而建构日常生活的“神性”，就是将日常生活升华或艺术化。在于坚看来，在泛神信仰普遍存在的中国，神性并不神秘，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做任何事，都不是就事论事，都有一种升华在里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将日常生活写入诗歌中，无疑是诗人升华日常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了。所以于坚说“把一个活着的人写到诗歌里面去，等于你要把他变成诗教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升华。”<sup>④</sup>将日常生活写入诗歌，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就是建构日常生活的“神性”。于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升华日常生活：

其一，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个人的升华。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物形象完成了从“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转变，即抒情主人公从人民代言人的光辉形象，向世俗、独立有时甚至是猥琐的个体转变。早在1982年，于坚就创作了《罗家生》和《澡盆里的拿破仑将军》。前者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了罗

家生平凡的一生，上班途中的日常、工作间隙中帮同事修表、结婚、工伤导致的死亡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时代的风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后者将叱咤风云的英雄还原为洗澡时怕水烫而向母亲撒娇的黄毛小孩。这两首诗预示着于坚诗歌人物的两个维度，一是为日常生活中三教九流立传，于坚诗中人物形象丰富而立体，历史创伤的受害者、充满阳刚之美的工人、忍辱负重的父亲、慈祥的外婆、处于社会边缘却不放弃对日常生活品质追求的小人物等等，这些人无不充满了生活气息，鲜活可爱，更因为被写入诗歌而获得艺术生命力。二是对伟人的祛魅，还原其日常面目，除了上文提到的《澡盆里的拿破仑将军》，还有《日子》《大池》《伊曼努尔·康德》《弗兰茨·卡夫卡》《文森特·凡·高》《影响》《巴黎·在雨果故居》等，其中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思想巨人、天才作家、疯狂的画家等，不再远离日常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充满日常人情趣味。他们虽然被祛魅，却因写入诗歌而升华。

其二，对日常生活事件与事物的升华。于坚热衷于对人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琐事的书写，铺路、装修、客人来访、探访病人、送别朋友、开会、搬家、停电、吵架、买菜、打呼噜、游园、结婚、生子……日常琐事因而获得艺术化的提升。而啤酒瓶、啤酒瓶盖、油桶、蝴蝶、灰鼠、棕榈树等日常之物，也因写入诗歌而不朽。

其三，对日常生活中私人历史的升华，以私人化历史来解读既定的历史，无形中消除了历史的厚重感，个人的历史也获得艺术的升华。相比韩东《大雁塔》中对既定的宏大历史的无情的解构，于坚更有建构历史的自觉，如《尚义街六号》中，“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sup>⑤</sup>，表现出诗人对建构历史的兴趣。于坚的许多诗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如《致父亲》《节日的中国大街》《我的歌》反映了诗人所

<sup>①</sup>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22页。

<sup>②</sup>于坚《棕皮手记·1982~1989》，《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sup>③</sup>需要指出的是：于坚在早期是论中是反对“升华”的，他反对的是功利化的、带有目的性的升华，更反对意识层面的升华，从而以升华的意识形态来否定具体的、原初意义的日常生活。参见于坚《棕皮手记·1996》，《棕皮手记·1997~1998》，《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第69页。而本文中的“升华”，则是于坚基于用诗歌来提升日常生活地位这一层面而言的。二者的出发点不同。这种前后矛盾也反映了于坚诗学随时代变化而作的修正。

<sup>④</sup>于坚《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于坚、傅元峰对话录之一》，《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9-211页。

<sup>⑤</sup>于坚《尚义街六号》，《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代表的新一代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有朋自远方来》《远方的朋友》《致一位朋友》描述的是于坚、丁当、韩东等诗人共同组建“他们”群体的一些历史细节，《成都行》则是功成名就的诗人对1986年的“诗歌起义”的回顾。《作品49号》从一个发迹者身上展现“下海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影响，以及给人们内心造成的震撼。但这种历史是琐碎的、日常的、个人化的。拿“文革”来说，“文革”在诗人的记忆中是不受束缚与监管的自由，是青春期的躁动，“1966年的中国广场/我几乎被这虚无的辽阔淹死”<sup>①</sup>，“欢呼从此停课/找出闲置多年的弹弓/我比我的国家好玩”<sup>②</sup>；当别人都在忙于批斗，诗人却欲望勃发，甚至当着这批斗场面手淫<sup>③</sup>，当别人批斗父亲时，诗人看客一般地希望父亲能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被枪毙<sup>④</sup>。诗人以个人的记忆，揭示了那段岁月的荒诞与人性的脆弱，凸显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助感。这些私人的日常历史，具有斑斓的色彩和人性的温度，是对宏大历史叙述的有效补充。

构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升华日常生活，源于于坚对诗歌创作的虔诚。他认为写诗是为天地立心的伟大事业，这种虔诚是于坚日常生活诗歌的重要特征。很多诗人以日常生活为武器登上历史舞台，但终究湮没在日常生活写作大潮当中。他们的诗歌内容琐碎，语言低俗，精神萎靡，让人不忍卒读。这不仅是对日常生活诗歌的戕害，更是对诗歌创作本身的亵渎。正是因为这些诗人放弃了对诗歌创作的严肃态度，他们也无力将日常生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只能沉溺于日常的碎片中不能自拔。而于坚的日常诗歌，则努力升华日常生活，引导读者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随着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人们在经济浪潮中逐流扬

波，诗人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但于坚还是在坚守着对诗歌创作的虔诚，《他是诗人》《面具》《彼何人斯》这几首诗是诗人面对边缘化处境时的夫子自道，不管时代如何喧嚣，于坚都守护着诗歌创作的净土。

### 三、柔软——诗人对日常口语与日常经验的推崇

在于坚的诗论中，突出了“柔软”与“坚硬”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于坚认为日常口语（方言）是“柔软”的，普通话是“坚硬”的；日常经验中的常识是“柔软”的，知识是“坚硬”的。于坚是要为日常口语和日常经验入诗提供合法性。

用“柔软”来形容南方的方言，大体上还是恰当的，用“坚硬”来形容普通话，则过于绝对，这是于坚为清理汉语意识形态化采用的策略。于坚认为普通话是意识形态化了的汉语，“普通话虽然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但它推广的只是部分官话，也就是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全面统一的官话”<sup>⑤</sup>。普通话居于庙堂之上，过多地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载道的工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而柔软的汉语只能在民间的方言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保存。甚至，普通话和方言竟然构成了先进/落后的阶级对立<sup>⑥</sup>，这是于坚难以接受的。《峨山三首》显示普通话在沟通中的强势地位，只会说方言的人几乎丧失发声的机会<sup>⑦</sup>。《便条集·212》描述了全民学普通话的现象，“所有的舌头/都模仿着电台的播音员/用普通话/朗诵汉语”<sup>⑧</sup>，普通话是汉语的一种，用普通话朗诵汉语，突出了普通话对汉语的窄化，对方言的处境表示担忧。《便条集·52》讲普通话的老妇人有一张“狼脸”，用“狼脸”这个充

①于坚《巨擘·海洋》，《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②于坚《巨擘·光明乃黑暗之背》，《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③于坚《巨擘·那段时间多么炎热》，《巨擘·性欲》，《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3—116页。

④于坚《巨擘》，《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⑤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⑥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的序言中，谈到“普通话”和上海方言之间阶级差异：普通话是“同志们”的日常语言，上海话被归为“小市民”的语言。于坚对普通话的偏见与王安忆的自陈得以互证。于坚反抗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具有阶级优越感的普通话。参见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⑦于坚《峨山三首》，《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55页。

⑧于坚《便条集·212》，《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满感情色彩的意象,表现出诗人的不满。<sup>①</sup>在散文《优势》中,诗人直接跟带着京腔的采访者说他听不懂普通话,这对普通话的排斥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了。<sup>②</sup>

正是基于普通话的意识形态化和对方言的压制,于坚大力提倡口语写作。“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实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口语写作丰富了汉语的质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轻松、人间化和能指世界的力量。”<sup>③</sup>这也就为日常口语入诗提供了合法性。在于坚的诗歌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云南方言词汇,如过老年、汽锅、莫要、莫管、补巴、老伙子、老儿子、老女儿、包谷、佯噶、真孃等,也不避讳狗蛋、乡巴佬、疯子、杂种、傻B、泼妇、狗日的、操蛋的等充满市井气的俚语粗话。即使是大白话,通过节奏和形式的整合,也能成为一首饶有趣味的诗歌。如《男子汉不爱那种姑娘》这首诗,其内容只是男子大白话的择偶观,但诗歌形式套用了民歌的形式,节奏欢快,读之朗朗上口,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能够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单纯朴素的择偶观。鲜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口语,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成为于坚诗歌的一大特色。当然,口语入诗还需诗人的提炼与加工,于坚强调诗歌在口语之外,还需要“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sup>④</sup>,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口语观。<sup>⑤</sup>因此,于坚的口语诗与后来甚嚣尘上的“口水诗”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知识即权力”,当知识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它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制力量。于坚诗论中常提到诗歌是“在途中的”,是“不知道的”<sup>⑥</sup>,实际上

就是要消解知识的权力。有些诗人沉溺在西方的知识当中,却忽视了这些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脱节。这些西方文化的知识在于坚看来是“坚硬”的,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粘合度不够。以“玫瑰”为例,于坚在《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说“我从未对这个词感过兴趣,因为它于我的存在无关。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不适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的外祖母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对于我,它只是一个现成品,一个已完成的象征。”<sup>⑦</sup>玫瑰与诗人日常生活脱节,正是于坚拒绝歌唱玫瑰的原因。实际上,于坚并不排斥写“玫瑰”,1991年于坚就写了三首,分别是《被暗示的玫瑰》《正午的玫瑰》《正午的玫瑰 另一种结局》,1994年写了《关于玫瑰》。《被暗示的玫瑰》以从未在人们生活中出现的玫瑰,却以被暗示存在的方式,“陪伴我们度过快乐而忧伤的一生”<sup>⑧</sup>,来讽刺西方文化资源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困扰,《关于玫瑰》中以“在一个没有苍蝇的四月怀念着同样没有出现的玫瑰/这就是世界的黑暗”<sup>⑨</sup>,重复了于坚对玫瑰与诗人日常生活相脱节的看法。而《正午的玫瑰》《正午的玫瑰 另一种结局》则由诗人种植玫瑰失败经历写成,这是于坚让玫瑰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努力。也就是说,于坚对西方资源的态度,并不是一味排斥,而是要努力将西方资源与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样,才能软化西方文化知识的“坚硬”。

除了对西方“坚硬”的文化知识表示警惕,于坚更是对汉语所负载的文化知识深表担忧,语言的命名能力已经被文化与知识的隐喻所遮蔽。要重新激发语言的活力,就要对隐喻进行清理,而以“柔软”的常识与日常经验代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梦见一只老虎》可以看作是于坚拒绝隐喻理念

①于坚《便条集·52》,《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②于坚《优势》,《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9-10页。

③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④于坚《棕皮手记·1982~1989》,《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⑤于坚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关于口语的观点,认为语言中的“雅”是不能抛弃的,并说“在80年代,作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崇拜者,我曾经相信口语是一个引领新诗飞翔的天使,而在今天,对此,我已经没那么迷信了”。这也证明了于坚强调口语观的时代性和策略性。参见于坚《在喧嚣沉默中 自由体诗人的成熟》,《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2页。

⑥于坚《棕皮手记·1999~2000》,《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⑦于坚《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于坚思想随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274-275页。

⑧于坚《被暗示的玫瑰》,《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⑨于坚《关于玫瑰》,《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于坚的其他诗歌中则能看到常识与经验在其中的恢复。所以,鹰在诗人的眼里是“普通的鸟比麻雀大些”<sup>①</sup>,天鹅是“我只能说它长得比鸭子更肥一些 如果烤一烤/加些盐巴 花椒 味道或许不错”<sup>②</sup>,海鸥是长着红色透明的蹼、吃着面包屑的海鸟<sup>③</sup>,老鹰、天鹅、海鸥的隐喻被剥离之后,展现了诗人日常经验中的形象,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剥离词语身上坚硬的知识隐喻,而用柔软的日常经验来重新唤起词语的活力,反而激发了语言的表现力。比如,“春天”这个词语,如果遵从其固有的文化隐喻,已经很难写新意了,但在《春天咏叹调》这首诗中,用诗人独特的日常生活经验,激活动词的表现力,“踢开、翻进、撞到、打泼、一把抽掉、滴下”这些动词的使用,塑造了春天的顽童形象。“那些红脸膛的农妇 咧嘴大笑”<sup>④</sup>,“红脸膛”具有鲜明的高原特征,用高原农妇的欢笑来表现出春天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整首诗通过对日常经验的激活,细致地表现出春天由弱到强的动态变化,为我们描绘了别样的高原春天。

#### 四、后退——诗人对现代化的忧虑

于坚非常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体现在于坚诗论中对“后退”的强调。“后退”一词的提出,一开始针对的是线性向前的时间崇拜。于坚认为古人的时间有两个维度,“一个指向的是短暂的现在,一个指向永恒的过去和将来”,而1966年以后,只剩下“向未来前进的向度”<sup>⑤</sup>。时间崇拜的背后,是对现代化的极度渴望,唐晓渡指出,这种线性向前的时间神话,“归根结底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sup>⑥</sup>,正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对现代化抱有极大的期待。“唯快是好、唯新是好”成为人们的普遍心

理。如《便条集·122》中,乘客们不断地核对时刻表,生怕错过时间,生怕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以至于忽略了车窗外落日的景致。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下进行的现代化,必然引发阵痛。于坚的“后退”观就由对时间崇拜的批评,扩展到对过度现代化的担忧。于坚诗中所表现的现代化阵痛主要有:

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于坚很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以诗歌的形式持续关注之。河边本是恋人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在《那人站在河岸》中,河流就如从城市爬出的一条黑烟,里面充满了口痰、粪便、鼠尸、罐头盒、蚊子、破鞋子等,再也无法给爱情增添一丁点儿的浪漫。《作品89号》,曾经拥有着深深的苍穹、鹰群、蓝色山岗、红色农场、乌鸦等的城郊,已被垃圾、废品、烟囱和大工厂所填充。《便条集·113》则表现了一场生态灾难,“公元1998年/青蛙之国灭亡/故乡的浅草池塘/死亡”<sup>⑦</sup>。又如《便条集·73》“古代的肺在工业的天空尖叫/它被人民日新月异的新假牙/一立方一立方地咬掉”<sup>⑧</sup>。尖叫突出了森林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无助,“一立方一立方”使得森林遭到侵蚀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

二是现代化进程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挤压。都市是现代化的象征,而老城或者乡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最后避难所。列斐伏尔指出,在都市的扩张过程中,“我们已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sup>⑨</sup>也就是说,非都市化空间在现代都市扩张的挤压下消失,且转变、生成为新的都市空间。比如对老城、旧建筑的拆除,是为创造出新的都市空间。《便条集·106》如此写道:

毁灭一座古老的城市/毁灭一种传统/可以通过火山和地震/也可以通过原子弹/也可以革命/但最有效的是/文件<sup>⑩</sup>  
在一纸政令中,整个社会陷入了大拆大建的现

①于坚《关于鹰的诗·第三首》,《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②于坚《在丹麦遇见天鹅》,《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③于坚《赞美海鸥》,《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④于坚《春天咏叹调》,《于坚集·卷1》,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⑤于坚《时间的向度——答魏玛文学国际问》,《于坚集·卷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199页。

⑥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⑦于坚《便条集·113》,《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⑧于坚《便条集·73》,《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⑨[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⑩于坚《便条集·106》,《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代化进程中,多少充满市井气息的生活空间被抹平,多少凝聚着传统工匠心血的传统建筑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城中村》展现的是城中村被拆前分崩离析的一幕,充满日常气息的咸菜坊、裁缝店、铁匠铺关门,德高望重的老人离世,唱响了城中村的挽歌,“要么加入”这个进程,进入统一规划的城市,“要么滚蛋”,离开故土。<sup>①</sup>《喋戈布丁》这首模仿保罗·策兰《死亡赋格》的诗,诗题谐音“拆个不停”逼视拆迁过程所造成的伤痛,如“真孃一掀被窝逃上屋顶变成了火天鹅”,无疑是拆迁悲剧的一个缩影。“一张张白纸真干净”<sup>②</sup>是对拆迁的莫大讽刺。这些日常生活空间如果加以改造,必然会给人们留下更多情感记忆,但拆迁是将它们完全推倒,以转变为新城市的空间,给人们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第三是技术权力对人的规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技术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整合与规训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带来人的异化。如《便条集·40》写的是一个闹钟,闹钟的功能是体现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事,人们的日常也就被她整合,“切削着我的时间,像切削/一只装在车床上的铸铁”,“它最终要把我车成一只/合格的螺丝”<sup>③</sup>用生产线的“车”这一动词,暗示人被异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颗螺丝的危险。类似的,《便条集·182》则呈现了人被时间异化的后果:在时间的规训下,人的日常生活被拆解成为一系列的动作,“起床、大便、跑步、早餐、进门、把门关上、离开办公室、打开电视”<sup>④</sup>,即使丢掉了手表,他也自觉以现代化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作息。

《0 档案》深刻地展现了技术与权力的结合对人的异化。档案的生产与管理都具有一套技术化的体系。而在中国,档案在某个时期,更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话语,曾经主宰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档案是技术与权力完美结合的典范。诗中展现了档案制度化的生产过程,即技术权力如何将日常生活中

鲜活的个体编码为一系列的符号:

进去 点头 嘴开 嘴闭 面部动 手动 脚动 头部动 眼球和眼皮动 站着坐着面部不动 走四步 走 10 米 递 接过来 打开 拿着 浏览 拍 推 拉 领取/点数 蹲下 出来 关上 喝 嚼 吐 量 刷 抄 弯着<sup>⑤</sup>

主人公工作的日常被简化为一个个分解式的程式化动作,这是档案生产对个体的长期规训的结果,“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势,它还造成了姿势与全身位置的最佳关系,而这正是效率与速度的条件”<sup>⑥</sup>。在福柯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对每个动作的控制,使得身体与动作相协调,来提高生产的速度和效率。而在本诗中,对动作的规训则极大地满足了档案编码的要求,档案生产将主人公工作日常编码为档案话语时,遇不到任何抵抗,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编码的效率。个体如机械一般地运作着,早已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一具具符号空壳。《0 档案》为我们展示了技术权力给人们造成的荒原般的境地。

要减少乃至消解现代化的阵痛,要将人们从被技术权力异化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后退”就意味着思维方式不再只是直线向前,而是适度向后。“后退”是对古老智慧的继承和发扬,于坚常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古老而朴素的智慧,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推进应该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与大自然的和谐,从而减少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提升现代化的品质。“后退”是对日常生活的回归,日常生活是旧的,是缓慢的,但于坚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时间的溃败。如《梅花》这首诗中,木匠雕刻在木门上的梅花,历经一百多年,却依然栩栩如生,“令春天不朽”<sup>⑦</sup>。“后退”,是为人们保留说“不”的权力,当人们的身心从现代化进程中解脱出来,获得的是恢复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打开一本诗集,欣赏一处风景,凝视一件艺术品,甚至创作

①于坚《城中村》,《彼何人斯:诗集 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2—83页。

②于坚《喋戈布丁》,《彼何人斯:诗集 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87页。

③于坚《便条集·40》,《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④于坚《便条集·182》,《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⑤于坚《0 档案》,《于坚集·卷2》,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⑥[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72页。

⑦于坚《梅花》,《彼何人斯:诗集 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127页。

文艺作品,都能使人摆脱异化的危险。“后退”,不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拒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是以退为进,是为人们保留诗意栖居之地的努力。

### 五、结语

于坚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他始终站在日常生活的坚实大地上,与日常生活被忽视被规训的现状进行斗争。于坚也是诗教传统的传承人,日常生活的

守候者,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他坚守在日常生活的城门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坚如巫师一般,在诗论中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诗歌理想以及对现实的关切。要理解于坚,就要从整体上把握于坚的诗论,分析其诗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笔者所讨论的四个关键词,较为清晰地体现了于坚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脉络,建构了于坚日常生活诗学的整体性,传达出诗人强烈的现实关怀。

(责任编辑:袁宇)

## Four Key Words in Yu Jian's 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Poetics

LIU Shu-jing<sup>1</sup>, LENG Lan-xi<sup>2</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Yu Jian's poetics is the cornerstone of his daily life poetics. In his poetic theory, four key words—touch, divinity, softness and retreat—are worthy of attention. Touching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 and daily life, and removes the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in the poet's writing of daily life poems. Divinity embodies the poet's efforts to sublimate daily life and his/her devotion to poetic creation. Softness initiates the process of cleaning up the ide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power attached to language and provides legitimacy for the entry of daily oral language and empirical common sense into poetry. Retreating conveys the poet'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lthough these four words can not cover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Yu Jian's poetics, they clearly show the context of his daily life poetic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Yu Jian; daily life poetics; touch; divinity; softness; retreat